



主体、想象与表达

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谢保杰 著



博雅文学论丛



博雅文学论丛

主体、想象与表达

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谢保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谢保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6298-6

I. ①主… II. ①谢…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1949~1966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608号

书 名	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著作责任者	谢保杰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9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258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这本书值得一读。

为什么？最简便、直接的理由是：本书对“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很少有人问津的，用最流行的说法，本书“填补了研究空白”。

但又不只是“填补了空白”。

请注意作者自己的陈述：“（本书）无意对‘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进行肯定，为之翻案，使之重新进入文学史；也无意利用今天的价值观对它们进行否定；甚至也不想讨论这些写作在今天的真正意义，我所做的工作是将之‘历史化’”，“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这正是我们感兴趣而要讨论的：本书提供的是怎样一幅“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作者为什么要采取“只述不论”的研究与写作策略？

本书描述的文化、文学图景出现在1949—1966年，实际是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也即共和国历史前十七年或二十七年。本书一再引述毛泽东1949年9月的宣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在世界”，这应该算是历史的开端。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一开始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工农教育也成了新中国教育的主体，于是，就有了建国初期的“识字政治”和“向文化大进军”。这是可以以一系列的数据作为历史的记录的：从1949年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总计扫除文盲9940万人，全国人口，特别是

工农兵群众的文盲比例大幅度下降。在“向文化大进军”中，部队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各连都配备了文化教员，以团为单位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各师都有速成小学，军办速成中学。在五十年代的鞍钢各厂都有业务学习班和文化学习班，全市有各专业的夜大。还有4200多万的农民参加了1951—1952年冬季学校的学习。全国所有的正规中学、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都向工农兵子女敞开大门，录取和助学金上都给予特殊照顾。这样，就依靠国家政治的力量，把因为不识字而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工农群众带进了新中国历史运动中，并使之成为国家的主体。

组织工人、农民群众文化活动也成为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的首要任务。据统计，到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时，全国18个主要城市就有730个工人俱乐部，全市性的工人文化宫有16个。这些组织背后，都隐含着—个信念：工人阶级乃至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要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也被提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这背后也有—个文学想象：工农兵不仅应该是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更应该成为文学的创造者，这样才能全面地确立工农群众在文学上的主体地位。在党的统一领导、国家权力的全力支持下，这样的文学想象迅速落实为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安排：除专门成立培养工农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中央到工人集中的大城市，纷纷成立文学创作小组，举办短期训练班，开设文学讲座，建立通讯员制度，所有的报纸杂志、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向工人的业余创作开放。更有很多专业作家以极大的热情辅导工农作者写作，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出席的青年作者约500人，其中82%来自工厂、农村和兵营，他们中间后来就出现了一批以唐克新、胡万春、万国儒、阿凤、高玉宝等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鲁迅当年曾经设想，希望借助“政治之力”，使“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通过普及教育，使之掌握文化，并且有了觉醒，自己开口说话，写作，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会创造出“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在新中国，鲁迅这样的先驱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但工农兵作家在展现了自己的全新风貌，并得到社会承认以后，又

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与困惑之中。主要有两个身份限制。一是“党所培养的作家”的身份。如茅盾在1962年写给胡万春的信里所说，“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将结论教导你们”。本书作者也有一个分析：工农兵作家“他们从文盲、半文盲到开始写作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就是一种（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种（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支撑他们写作的唯一话语资源，他们在表达的时候也只学到一种话语方式，那就是歌颂。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所以后来孙犁在总结他所培养的工人作家阿凤的创作时就说，他“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尽管不可否认这样的颂歌的真诚，但毕竟是一个写作视野、深度、广度上的限制。另一个身份限制是“阶级的代言人”。孙犁就曾这样谈到束缚工人作家的“清规戒律”：“工人作家，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一言一行，影响巨至。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个概念，他既要选择正面，又要选择先进，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又必定叫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其作品枯燥无味，就定而不可移了。”本书作者也引述一位研究者的意见，谈到工人作家在塑造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时所面临的处理“阶级主体”与“典型的个体”之间关系的困境。其实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所谓“阶级主体”就是“党主体”，“阶级的代言人”也是“党的代言人”，因此，孙犁所说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礼”就是党的观念与意志。最终支配工人作家的创作的，正是这样的党之“礼”。新中国的工农兵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党的文学。本书作者说，工人作家“是荣耀的光环，同时也是沉重枷锁”，这是不无道理的。但又必须看到，无论是对党的歌颂，还是对党之“礼”的服膺，对当年的工人作家来说，都是从自身的经历与成长中引发出的自然选择，是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我们今天重读他们那时所唱的颂歌，在感慨其幼稚与简单时，又不能不被其中的真诚、清纯之气所感动：那样的共和国幼年时代的文学，是再也不可能重复了。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建国前二十八年对工农作家的培养，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即毛泽东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来说，培养和造就本

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改造和征服异己的知识分子,是同一个历史任务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目的就是要“颠倒”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把掌握了话语权的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愚蠢的高贵者)变成受教育者,被批判、改造者,甚至失语者;被压迫者、没有话语权的工农群众(聪明的卑贱者)不仅要夺回话语权,而且要成为教育者、批判者,以至压迫者。而且这样的“历史的颠倒”论也直接影响了工农作家的创作,他们在歌颂体力劳动及劳动者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贬抑脑力劳动和知识分子。

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新民歌运动,除了他的“人人能劳动,人人会写诗”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乌托邦理想,一个现实的目的是要将培养工农作家的经验推广到全民,以建立“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以和他已认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教授”“文艺家”对抗,最后取而代之。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更自觉地号召“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并完全取消专业作家,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应直接由工农兵作者创造,而且要坚持业余性,以保证永远不脱离劳动与劳动人民,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就成为更加纯粹的党的文学了。

从以上的简述里,已经不难看出,这一共和国前期独有的“工农兵写作”的文化、文学图景,是十分复杂的,具有多层面的相互纠缠的因素、影响与作用,它对我们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研究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从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鲜明立场出发,将其妖魔化,或者理想化。这都会对历史的多面性与多效应性形成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遮蔽。我以为,这就是本书的作者要宣布,他既无意为其“翻案”,也不愿对其大加批判的原因所在。他所能做的,就是面对“一切事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应有的复杂性、丰富性,以至模糊性。应该看到,“工农兵写作”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极多,是一时看不清,想不明白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距离。这是能体现历史研究的“长时段性”的: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历史事件和人物多方面的矛盾暴露越充分,评价越客观,越具有科学性。有些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

一下,不要急于作结论。与其轻率作判断,不如下功夫把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搞清楚:这正是本书作者选择的研究策略,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具有启发性。

其实,作者今天之所以可以做这样的选题,也是因为有了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当作者复原了五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文化、文学图景,今天的读者是会有一种陌生感的:在当下中国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文化、文学图景“业已消失”,以至于我们甚至会觉得,作者是在写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难道真的会有那样的时代,工农教育、工农文化会成为国家教育与文化的核心,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文化机构,都向工农兵和他们的子女敞开大门,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工人作家、农民歌手会成为“天之骄子”?这一切,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现行的社会结构里,工人、农民已经成了弱势群体,历史再度“颠倒”过来,他们又成为社会不公平的受害者;在现行的国家教育、文化体制里,工人、农民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不用说他们自身接受教育、享受文化的权利被严重忽略,他们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虽然最近这几年出现了“打工者的文学”,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延续性,但其影响、作用,在文学整体中的地位,都今非昔比;而且其文学内涵、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也迥然有别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学。

我们不能只是惊异、感叹,更要思考与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又会涉及太多太多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在“结束语”里,即讨论到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由此决定了发展道路、依靠对象的不同选择,发展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与机制的变化,等等。继续追问下去,又会涉及共和国前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动等等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我们还不能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共和国的前后历史简单对立起来,也要像前文所强调的那样,面对一切事实,揭示其内在的一致,以及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过程,其中的种种复杂关系与多重效应,等等。——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作者选择这一“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的课题,其实是无意中触及共和国历史(不仅是共和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通常说,文化、文学研究都要“以小见大”,但本课

题背后问题之“大”，也即其包蕴的历史与现实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恐怕是作者最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作者也是清醒的，因此，他只做了他能够做的，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了读者与以后的研究者。这样，本书的写作就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开放性。我们对本书的阅读与评价，也就不能仅限于作者写到了什么，更要重视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其所开拓的更为丰富、更有吸引力的研究前景。

简单地说，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业已消失，已被遗忘，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共和国曾经有过的文化、文学图景，这古老故事的新开掘，自然是能够逗引兴味的；但它更给我们提出了许多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清楚的问题，更能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和思考、创造冲动：这或许是更有趣的。

这本书值得一读！



2013年8月18—20日

(发表于《书城》2013年第11期)

目 录

序: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钱理群/1
绪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内容	3
三 研究的方法	3
四 研究综述	5
第一章 相关的几个问题	8
第一节 “国民文学”的提出	8
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	13
第三节 “文艺大众化”	19
第四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21
第二章 新意识形态的确立与新主体的生成	30
第一节 “身份的政治”	30
第二节 “把砖头砌进墙里”: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39
第三节 “识字的政治”	46
第四节 新的创作主体的再造	58
第三章 1949—1966 年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	68
第一节 上海工人写作	70
第二节 天津工人写作	75
第三节 草明与鞍钢工人写作	83
第四节 “南胡北万”	93
第五节 《沙桂英》	105

第四章 《高玉宝》的写作及相关问题	115
第一节 《高玉宝》文本的生成	115
第二节 “理发员”荒草及其对《高玉宝》的修改	122
第三节 《高玉宝》与“文化大进军”	127
第四节 《高玉宝》:一个诉苦的文本	137
第五节 “周扒皮”及其地主形象	144
第六节 悠长的回声:“革命危机时代”的“新场面”	149
第五章 1958年的新民歌写作	156
第一节 1958年新民歌写作的历史描述	156
第二节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177
第三节 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诗经”:《红旗歌谣》	183
第四节 “改了洋腔唱土调”:群众写作浪潮下的专业诗人	192
第五节 “全民写作”的文化想象	200
第六章 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写作	207
第一节 工厂史、公社史写作	207
第二节 部队史写作	213
第七章 《创作,需要才能》及其批判	214
第一节 “精神财富的质量问题”	214
第二节 《创作,需要才能》及其批判	216
第三节 与写作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220
结 语	232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0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建国后的十七年(1949—1966)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在完成。尽管这一阶段的前期(1949—1956)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但是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权威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整个“十七年”来说,基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阶段发生的文学,我们可以统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从整体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学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和以往的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封建阶级文学)相比,应该处在一个更高的阶段。总的来说,“十七年”发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表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因素。具体来说,表现为新的主题(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新的人物形象(工农兵或者英雄人物)、新的形式(秧歌、歌剧、民歌、相声、鼓词)、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新的读者(工农兵)、新的作者(工农兵作家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作家)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再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传统的考察文学的四个维度——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就“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者——作者来说，有两条思路或者说线索：一条是改造知识分子作家或者是专业作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另一条是在工农兵中直接培养自己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有一种持久的乌托邦冲动，或者说“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有一种最高理想，就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让工农兵由文学接受的主体变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不仅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最高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

关于“十七年”文学生产者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就第一条线索而言，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条线索也被赋予更多正面的意义与价值。而第二条线索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脉络中也没有相应的位置。这一消失的文学现象就其原因来说不难追溯，简单地说，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几经变迁，知识范型不断转换相关。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工农兵是社会生活的主角，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居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享有无上的光荣与尊贵的身份。到了八九十年代，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以后，工农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不再是话语的中心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到1990年代以后甚至被人称为“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整个社会知识范型不断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的嬗变。对于工农兵创作的相关研究，在当下面临着尴尬。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文学史所确立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文本叙述线索在1980年代遭到抛弃，同时在1980年代确立的“启蒙”文学史叙述所建构的文学图景是“让文学回到自身”，以及对“文学性”的强调，在这种文学语境下，工农兵写作要么因为“政治太多”而不是它“自身”受到指责，要么因为“艺术太少”造成“文学性”不足而被漠视。而在1990年代确立的现代性文学史叙述主要是对“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主要是在思想史层面所做的工作，对于工农兵的相关创作则没有涉及。

二 研究的内容

尽管在延安解放区也曾有“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①的号召,但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精神,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培养工农兵作家还是在建国以后。本书认为建国后在工农兵写作方面,有三种创作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十七年”时期,在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出现了一个工人创作的热潮,涌现出大批工人作家。二是建国后,在部队向文化进军的运动中,出现了高玉宝这样的士兵作家,高玉宝从文盲到作家在当时代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作家培养的样板意义。三是1950年代末期,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文化理想,提倡民歌写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全民写民歌的创作现象,也涌现了一批农民诗人。在新民歌运动后,天津作家吴雁写了《创作,需要才能》对工农兵创作现象进行批评,这种批评随即遭到批判。本书对吴雁的批评以及所遭到的批判进行描述,并对其涉及的创作与才能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因此,本书涉及一个创作群体(工人作家群),一个个案(士兵作家高玉宝),一个运动(新民歌运动),一次批判(吴雁),试图通过对这些创作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最后,针对1949—1966年的工农兵写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三 研究的方法

“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对这一写作现象的梳理与考察,其历史知识构成框架大体包括作者的身份信息,具体的作品信息,还有当时在场者的评论信息,以及所依托的时代的背景信息。这些历史的信息曾经是“十七年”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建构了中国

^① 康生:《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解放日报》1942年10月4日社论。

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

在“十七年”时期,工农兵写作之“工农兵”,并不仅仅是工人、农民、士兵的合称,它折射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多数场合下,强调的是阶级出身、政治身份,因此这一术语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具体到本书写作中,对工农兵作者的身份只能大致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作家,什么是工农兵作家,只能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综合的分析。当然这样做不是为了避重就轻,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这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写作中的流弊的判断,我认同这种判断。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政权在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对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文化理想或者说文学理想有什么样的历史期许和冲动。作为新的历史的主体——工农兵,出于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从政治翻身、经济翻身再到文化翻身的过程中,积淀着哪些历史的信息。当然,在对一些工农作者进行分析时,还是有必要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建国后,在工农兵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应该是浩然,但是考虑到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最大影响是在“文革”时期,而且我认为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下,他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专业的精神,对本论题的探讨不具有典型意义。

本书无意对“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进行肯定,为之翻案,使之重新进入文学史,也无意利用今天的价值观对它们进行否定,甚至也不想讨论这些写作在今天的真正意义。我所做的工作是将其“历史化”,对其作历史的描述与分析。在这方面,福柯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福柯认为出于一种历史分析的需要,可以把人文科学当作一个暂时不论其本身真理性的自足系统。他在《知识考古学》里说得很清楚:“对陈述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释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被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不露的因素……与此相反,它要知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

道的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①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一般的文物考古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本古书,上面说地球是方的,考古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它作了错误的陈述而否定其文物的价值。福柯不会去问“地球是方的”这句话说得对不对,他要问的是这句话在某时某地出现意味着什么。关于“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福柯的观点使我很受启发。站在今天的观点对当时的工农兵写作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不是本书的目的,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历史化”:我不会去说,你们那时的写作“政治太多,艺术太少”,是错误的;我只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描述和呈现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四 研究综述

关于工农兵写作的研究,最初的文学史叙述可以追踪至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②。在这部新文学史稿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敌后根据地的“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和出现于解放区的“工农兵群众诗”。史稿还附录了《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其中有一节特别谈到建国初期的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的文艺创作活动,介绍了一些工农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作家,他们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的新气象”。198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时,为了保持该书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的完整体系,王瑶先生将附录部分删除,但他坚持收入了1988年编的《润华集》。他认为这部分内容“似近于古代‘实录’的性质,是为后代修史提供根据的,从这种意义看,它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研究与反思,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③。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Pantheon, 1972, p. 107.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③ 王瑶:《润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工农兵写作在“十七年”编撰的文学史叙述里得到彰显。由华中师院编写、出版于1962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①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按阶级叙述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工农兵,工农兵的地位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得到空前的强调,工农兵群众创作也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在《史稿》的章节设置上清楚地发现这条线索,如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群众文艺”,主要介绍了苗得雨、王老九、李学鳌、崔八娃等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和一些群众的集体创作。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群众文艺”,介绍了温承训、韩忆萍为代表的工农兵诗人创作的诗歌,高玉宝创作的小说《高玉宝》,工人作家创作的《工人文艺创作选集》等。第三编第三章介绍了新民歌运动、革命回忆录以及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的写作。这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呈现了“十七年”时期整个文学、文化领域工农兵写作的具体面貌,它的叙述策略显而易见:“即培养社会主义工农兵作家,建构社会主义的工农兵文学。”在“十七年”时期,这一叙述线索和文学史叙述的另一条线索——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文学的整体格局。

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语境的变化,工农兵写作在文学史叙述中逐渐被淡化以至忽略。最近一个时期,真正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的是文学史家钱理群。在2005年写作的《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②一文中,他简要地勾勒了工农兵写作的历史发展线索,认为工农兵写作和革命知识分子写作是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不同想象与实践。钱理群把工农兵写作放在中国左翼文学宏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讨论的思路使我们很受启发。工农兵写作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本身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探讨,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总结。就像钱理群所说:“我们能不能以更为复杂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在

① 华中师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

② 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